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血吸虫病的防治*

李洪河

【摘要】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给疫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等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害。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血吸虫病疫区的党政部门和群众根据血吸虫病的流行规律及地区特点，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性生态环境治理与改造，普遍采用了查杀钉螺、管理粪便、管制水源和查治病人等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方法，使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疫区生态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后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 血吸虫病 生态环境 国家应对

【中图分类号】K27; 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4-0063-07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给疫区民众的人口变迁、乡村经济和生态环境等带来了深刻影响。党和政府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公共卫生事业的重大事项纳入国家行政范畴加以管理，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对血吸虫病进行了广泛调查和宣传，制定了相应的生态环境治理措施与规划，发动民众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消灭血吸虫病运动，使我国广大的血吸虫病疫区疫情得以控制，疫区生态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血吸虫病的流行及其生态危害

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虫病，该病在我国流行与肆虐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相关卫生防疫部门的大规模摸底调查，证实血吸虫病流行区遍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和上海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24个县、市。其范围北至江苏省宝应县，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横县，东至江苏省沿海地区，西至云南省的剑川县。^[1]上述流行区内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的分布面积达143亿平方米，患者近1000万人，其中晚期病人60万人，约有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其中尤以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6省最为严重。^[2]

血吸虫病也是一种具有地方性和自然疫源性的环境疾病，该病的发生和流行主要在于血吸虫病人病畜、含有血吸虫尾蚴的疫水和其中间宿主钉螺等三大生态因素的相互作用，因而具有严格的地理环境特征。根据我国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调查，江苏省全省患病人数在200万

【收稿日期】2012-2-16

【作者简介】李洪河，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453007。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10BDJ012)的阶段成果。

人以上,其中苏南的青浦、松江、昆山、嘉定等地区血吸虫病患者占当地人口的90%,苏北的江都、高邮等县的血吸虫病也几乎遍及全县^①。安徽省徽州专区的歙县和绩溪县血吸虫病流行严重,歙县六区的槐棠村、狮牌村的典型检验证实患此病者占总人口的65%以上,绩溪县洪川乡99%的人患有此病^②。通过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调查,证实浙江省共有嘉善、嘉兴、桐乡、崇德、海宁等47个市县存在程度不同的血吸虫病,患者约有150万人以上,占上述47个市县总人口的11%^③。

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给疫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等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害,它不仅使广大民众的身体饱受疾苦,更主要的是其直接危害了广大民众的生命、生产、生活、生育和生长:

一是土地荒芜、房倒屋塌现象严重

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回顾性调查,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原有张、朱、熊等18姓1400余户、4000余人口、耕地6000亩,因血吸虫病危害,到1949年全村仅剩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女孩,大片土地荒芜。^[3]湖北省江陵县资市乡本是一个富饶的产米区,由于血吸虫病为患多年,全乡12000亩肥沃良田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野,疫区人民生活无着,只能“春天吃鱼蒿,夏天吃野草,秋天吃米糠,冬天把饭讨”;房屋无力修理,任其坍塌,到处是残垣断壁,杂草没膝。^[4]上述情况在全国各地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内举不胜举。

二是“绝户村”、“寡妇村”众多

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调查资料,在民国时期的30多年间,江西全省疫区贫病交加,因血吸虫病死亡32万人,绝户5.4万户,毁灭村庄1315个,许多村庄成了远近闻名的“绝户村”。^{[3] (p.114)}还有因血吸虫病肆虐而导致的疫区男丁伤亡、妇女寡居现象。1955年11月,浙江省嘉善县通过对10个居民户的调查,证明血吸虫病对生命危害极大,这10户人家原有人口67人,10多年间因病而死44人,剩下的23人大都是孤儿寡妇,人们称之为“寡妇村”。^[5]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县昌化镇株柳村原是1100多户、4900多人的大村,解放时只剩下63户251人,其中寡妇68人,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6]

三是侏儒患者多,劳动力缺乏

因患血吸虫病,新中国成立初期诸多疫区的儿童乃至青壮年身体发育受阻,严重者则成为侏儒。据1955年江西医学院龙懿道报道,江西省玉山县疫区医院内晚期血吸虫病患者300人中有75人为此类侏儒,占25%。^{[3] (p.115)}另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典型调查,当时全国还有大约40%左右的血吸虫病患者劳动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约有5%~10%的晚期病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并且受到了死亡的威胁。^[7]1950年6月到1951年11月,湖南省地方病防治实验委员会在岳阳、临湘、湘阴三县进行疫情调查,发现血吸虫病流行所造成的劳动能力减退和消失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年轻力壮的血吸虫病患者染病之后时常发冷发热,四肢无力,久之便不能劳动,直至卧床待毙。^[8]

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肆虐使广大疫区严重荒凉。曾有报道称江西省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区内“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种,蒿草遍地,荒塚累累”,^[9]血吸虫病严重的生态危害不仅使新中国

① 《江苏省各地疫病情况严重》,《内部参考》1953年2月3日,第27号。

② 《皖南歙县等地血吸虫病严重危害着农民生命》,《内部参考》1953年5月5日,第100号。

③ 《浙江省血吸虫防治情况》,《内部参考》1953年6月30日,第148号。

面临着异常艰巨的血防任务，而且也给党和政府带来严峻的执政考验。

二、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行政部署

新中国成立以后，血吸虫病严重的生态危害逐步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49 年底，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某部在华东某地进行水上练兵时，有不少指战员感染了血吸虫病。华东军区卫生部在积极组织治疗的同时，将血吸虫病疫情上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卫生部随即组织 2000 余医务人员前往上海、南京一带，协助当地驻军防治血吸虫病，并在华东、中南建立了 7 所血吸虫防治所，进行经常性防治工作。^① 1950 年 4 月 21 日，卫生部发布《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寄生虫学家、农业化学家及市县乡村行政人员共商扑灭良策。^② 1951 年 4 月 10 ~ 23 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防疫专业会议，明确了今后防疫工作的方向，制定了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 19 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10] 在卫生部的领导与号召下，华东、中南、西南等地的部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积极行动起来，先后开展了血吸虫病防治试点工作。其中，浙江省的血吸虫病防治试点工作较为突出，到 1953 年 6 月，该省共成立了 3 个防治所、16 个防治站、200 个防治小组，调查了 26 个市县的血吸虫病感染率，治疗了 1.2 万多名病人^③。但限于人力、物力和缺乏明确的防治方针、规划等，新中国成立之初到 1955 年，全国各地防治血吸虫病的成效相当有限。

1955 年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保障人民健康、保护疫区生态环境和促进生产建设的急迫任务。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1955 年 11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时，专门听取了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防治血吸虫情况的汇报，并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11]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迅速成立了由中共华东局、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委书记以及卫生部、农业部同志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南方 12 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市、区的血防工作。11 月 23 ~ 25 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和“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具体步骤。^[12]

毛泽东亲自参与制定的“农业十七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6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 月 1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④。《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泽东的号召，成了全党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动员令。

1956 年 3 月、12 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上海先后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1957 年 2 月 6

①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第 4 册，1953 年 5 月，第 241 页。

②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卫生法令汇编》第 1 辑，1951 年 5 月，第 92 页。

③ 《浙江省血吸虫防治情况》，《内部参考》1953 年 6 月 30 日，第 148 号。

④ 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所：《毛主席 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血防工作的指示》，1967 年，第 3 页。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述报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批示指出“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完成防治任务的基本保证。”^[13]4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这就为全国各地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提供了科学规划和组织保障。

三、血吸虫病疫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与改造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组织和部署,使血吸虫病疫区地方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相当重视。1955年4月下旬,湖北省卫生厅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把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列为全省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并确定了“结合生产、动员群众、全面预防、重点治疗、控制发展”的防治工作方针以及五年内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计划。^[14]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也先后在1955年底制定了五至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广泛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各种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最主要的是疫区各地根据血吸虫病的流行规律和不同地区的特点,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综合性生态环境治理与改造。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查杀钉螺

钉螺是我国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查杀钉螺是为了消灭其宿主,杜绝其发育繁殖的巢穴。1956年大规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展开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血吸虫病疫区卫生防疫机关、血吸虫病防治小组等首先开展了钉螺生态习性与分布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从1956年初到1957年底的两年间,全国有血吸虫病流行的12个省、市、地区动员了大量的人力,在17.5亿平方米的面积上对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进行了一次到几次的剿灭,一些比较典型的市县如江西省余江、婺源、上犹,安徽省太平、祁门,湖北省谷城,湖南省慈利等7个县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100多个乡基本上扑灭了钉螺。^[15]

在灭螺工作中,疫区各地群众根据钉螺的生活习性和孳生环境,总结和创造的以改造生态环境为主,把灭螺措施与农田水利建设等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发展生产和消灭钉螺一举两得的成效。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围垦。此种方法适于湖沼型地区,主要是结合兴修水利,发动当地群众筑堤围圩进行垦植,改变自然环境以达到彻底消灭钉螺和增加生产的双重目的。1952~1953年,湖南省最先在杨林寨湖沼区开辟农场9000亩,使湖沼区有螺面积由7500亩减至175亩,钉螺自然死亡率由1%增至69.4%。这一办法后被广泛应用于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沼泽地区的广大农村。^[1]二是开新填旧。此种方法适于山区沟渠型地区,主要是在生长钉螺的水沟附近另开新沟,以开出的新土填没旧沟,以消灭钉螺。江西省余江县在1956~1957年春天结合兴修水利,采取了开新沟、填旧沟的修沟土埋办法,既消灭了钉螺又改善了灌溉水系,扩大耕种面积2000亩,增产粮食50万斤。^[15]三是挖河疏道。此种方法适于水网型地区,主要是结合挖河泥积肥、疏浚河道的方法,将河岸壁上的螺土深埋以消灭钉螺。1957年春季,上海市发动群众200万人次,将5000多条有螺河道全部抽干河水进行灭螺,消灭钉螺达95%。^[16]四是改水田为旱田。此种方法是在有钉螺孳生的水田改种旱地作物,再经过1~2年使钉螺停止繁殖、渐趋死亡。1958年上海市北郊将有螺水田622亩改种棉花等旱地作物,通过自然环境的改变造成钉螺生存繁殖困难,乃至最后死亡。^[1]

(二) 管理粪便、管制水源

从生态学的角度而言,管理粪便的目的是为了杀灭粪便中的血吸虫卵,防止未经处理的粪便污染水源,给血吸虫病以传染的机会;管制水源则是为了防止血吸虫病疫区水流中的尾蚴侵入人体或动物体内继续传染血吸虫病。新中国成立前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的血吸虫病疫区农村粪缸多置于村庄或住宅附近的河岸,露天无盖,雨天粪水四溢,流入河内污染水源。因生活习俗原因,疫区群众习惯直接从河中、塘中等取水饮用,因而造成血吸虫病感染。在 1951 年 4 月的一次检查中,苏南无锡县西部太湖边上的大渲村全村共有露天粪缸 186 只,其中 1/3 放置在河边。该村钉螺分布广泛,居民血吸虫病感染率很高,根据大便检验的结果,该村 422 人中有大便阳性者 128 人,感染率达 30.33%。^[17]

基于对粪便和水源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血吸虫病疫区各省都十分重视这一工作。湖南省从 1956 年开始进行“两管”防护工作试点,1957 年采取“先严重地区,后一般地区”的步骤在疫区全面展开,各疫区 50% 以上的乡、社、集镇基本上管理好了粪便。1958 年 7 月,湖南省在沅江召开全省粪管工作现场会,总结交流经验,制定了《湖南省防止血吸虫病粪便管理工作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全面管理,由低到高,综合利用”的方针,加强粪管工作。^{[16] (p. 282)} 1956 年大规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开展后,浙江省把管理好粪便和保护好水源看做是堵塞血吸虫病传染途径的一个重要环节,除将疫区各地的粪缸大部分集中并加荫加盖外,同时还在粪缸边设清水缸来洗刷粪具,保护水源清洁。为保持用水卫生,疫区各地除了分塘用水、在群众中订立管理水源公约外,还进行了修建水井、寻找山泉水源的工作。^[18] 广东省则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对四会等县粪便堆沤灭卵效果的现场试验,建立了粪便处理使用制度,对一些残塌崩漏的厕所、粪坑等提出一律加盖加棚、粪水不得外溢等要求。在管水工作中,广东省着重提倡饮用井水和自来水,血吸虫病流行区内先后建了一大批水井,保证村民都能用上井水等。^[19]

(三) 查治病人

要从根本上控制和逐步消灭血吸虫病,还必须积极治疗病人,恢复患者的健康,以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传染病原。新中国成立后疫区各省已开展了一定程度的血吸虫病治疗工作,如江苏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间共检查了 72 万多人,有 3.8 万血吸虫病人在有效治疗中恢复了健康^①,1956 年大规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开展后。全国各地疫区将已有科学成果如皮内反应实验、检查粪便的沉淀孵化方法等,广泛推用于疫区病人、病情的查证和落实。在此基础上,从 1956 年到 1957 年 8 月,全国各地血吸虫病疫区共建立了 19 个防治所、236 个防治站、1346 个防治组,培养训练了 1.7 万多名专业防治干部,有 309 个县市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工作。^[20] 在血吸虫病治疗方法方面,疫区各地卫生防疫人员和当地群众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如湖南省岳阳、沅江的研究小组分别采用锑剂短程疗法和中药加减胃苓汤对 290 个血吸虫病患者进行治疗,结果证明锑剂短程疗法安全疗效达 93.2%,中药加减胃苓汤对消除腹水和改善症状有明显疗效。^[21]

上述以传染源控制为主消灭血吸虫病的生态办法,在 1957 年底至 1958 年全国各地消灭血吸虫病运动中被广泛推广和应用。1958 年 4 月,江苏省结合积肥大搞灭螺和粪便、水源管理的运动,“将近 20 天时间,每天都有几百万群众奋勇作战,出现了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白天满地人,黑夜满地灯’的动人景象”。^[22] 同一时期,湖北、湖南、浙江、上海等疫区的广大群众在当地政府领导下,掀起了群策群力、热火朝天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

①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的问题》,《内部参考》1953 年 10 月 7 日,第 234 号。

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四、国家应对血吸虫病的生态成效与经验

在党和政府及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江西省余江县成为根除血吸虫病的标兵。余江县是江西省东部血吸虫病重灾区，该县在1955年中共中央提出限期消灭血吸虫病后，根据中央及省、地委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精神，制定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的计划。其具体方法主要是从生态环境治理和改造入手，采用“开新填旧”灭螺，藕塘变鱼塘、刨土培塘堤灭螺，以及改造厕所，进行粪管；保护水源，防止新感染；使用一遍到三遍的锑剂治疗血吸虫病患者等。在强调政治任务 and 进行群众性运动的方式下，余江县的大规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良好成效：钉螺被根除；收治4392名血吸虫病患者，死亡率仅为0.67%，治愈率达到95.5%。^[23]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当时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阅读这篇通讯报道后曾作《送瘟神》诗二首，其宏大的气魄和高昂的意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疫区群众。

随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截至1957年底，全国血吸虫病疫区共有江西省的余江、婺源、上犹、奉新、浮梁，湖北省的谷城、襄阳、大冶，湖南省的慈利，安徽省的祁门、太平，浙江省的德清、绍兴和上海市的北郊区、东郊区等13个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县、市和两个郊区；各地还有343个乡镇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全国各地治疗了50万病人，其中包括10万左右的晚期病人。^[24]在1958年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中，全国各地先后收治300多万病人，灭螺面积达33亿平方米，治疗病人数与灭螺面积均超过了前几年的总和。^{[9] (p. 251)}

血吸虫病疫区生态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疫区各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首先，大批病人被治愈，恢复了健康。有统计资料证实，到1957年9月底止，湖北省共治疗血吸虫病人14万人，有80%以上的人恢复了健康，体力有了显著的增长，劳动效率提高30%以上。^[25]另据1959年各地调查的结果，全国血吸虫病疫区病人治愈率已达85%以上，死亡率降低到0.1%。^[7]其次，过去杂草丛生、钉螺密布的荒野变成了良田。1958年春季，上海市在消灭血吸虫病运动中采取修水利、挖河泥、灭钉螺的办法，不但消灭了有螺河道中95%的钉螺，而且积肥1.5亿担，修治水利1808万土方，改良土壤25万亩，做到了除害灭病与发展生产齐头并进。^[26]再次，“寡妇村”、“绝户村”及劳动力缺乏状况被彻底改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根据1956~1958年湖南省湘阴县20个乡的统计，经过大规模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原来不能劳动、治疗后恢复劳动能力的有1681人，提高劳动能力的有3859人；“五保户”变成“自给户”的有249户，由贫农生活水平提高到中农水平的有882户，提高到富农水平的有315户；治好病后结了婚的有485人，恢复婚姻的有59人，以前因病未生育、现怀孕生子的有179人，治好了病在1957年参军服役的青年有37人，^[27]人民生活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20世纪50年代国家的血吸虫病防治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主要归功于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组织和动员，以及国家公共卫生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而从国家应对的视角出发，疫区各地对血吸虫病防治所采取的综合生态环境治理与改造措施，如灭螺、粪管、水管和治疗等等，尤其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的动员，需要政府有力组织

下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参与和群众性防治运动的开展。因此可以说,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的血吸虫病防治不仅显示了高效率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而且为我们今天血吸虫病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参 引 文 献]

- [1] 中华医学会 《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 年第 1 号。
- [2]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7 日。
- [3] 《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 1997 年版,第 114 页。
- [4] 魏文伯 《六亿神州送瘟神》,《人民保健》1960 年第 4 号。
- [5] 中共浙江省委除四害讲卫生办公室 《浙江省嘉善县防治血吸虫病的典型经验》,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 页。
- [6] 任振泰 《杭州市志》第 6 卷,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314 页。
- [7] 白备伍 《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成就和经验》,《人民保健》1959 年第 2 号。
- [8] 陈祐鑫 《湖南省地方病防治实验委员会血吸虫病防治实验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报告》,《中南医学杂志》1952 年第 2 期。
- [9]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 3 卷,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6 页。
- [10] 《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各种传染病防治方案 保护人民健康 保证国家生产和国防建设》,《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6 日。
- [11] 《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 年~1990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55 页。
- [12] 《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2 页。
- [13] 张显清 《云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史志》,云南科技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8 页。
- [14] 王肇槐 《湖北省大力防治血吸虫病》,《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22 日。
- [15] 季音 《数百万农民开始摆脱血吸虫病的威胁 全国有七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一百多个乡扑灭了钉螺》,《人民日报》1957 年 12 月 2 日。
- [16] 《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0 页。
- [17] 华东区苏南血吸虫病防治所 《粪便管理工作初步资料》,《华东卫生》1951 年第 6 期。
- [18] 屠正峰 《浙江人民防治血吸虫病的斗争》,《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24 日。
- [19] 黄飞 《广东省血吸虫病流行与控制》,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0 页。
- [20] 《卫生部进一步加强业务领导 三百多个县市防治血吸虫病》,《人民日报》1957 年 8 月 21 日。
- [21] 《湖南调查研究血吸虫病 为明年防治工作作准备》,《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7 日。
- [22] 陈光 《关心人民生活,消灭严重疾病》,《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24 期。
- [23] 李俊九 《苦战二年,人寿年丰——江西省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的经验》,《科学通报》1958 年第 15 期。
- [24] 《大战三年消灭血吸虫病》,《人民日报》1958 年 2 月 27 日。
- [25] 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 《全面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 页。
- [26] 钱信忠 《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 年第 5 号。
- [27] 中共湘潭地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 《血吸虫病防治战线上的红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 页。

[责任编辑:李 强、郑 珺]

Case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Inner Mongolia since New**China**——the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Reasons

at Dafuyugou Village Yu Yong (56)

Abstract: Dafuyugou Village is located in southwestern mountain region of Chifeng City , Inner Mongolia. Her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pretty good with lush vegetation before the 1940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d been severely damaged and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villagers were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After the 1990s ,the destroy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d been reversed. Two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of Dafuyugou Villag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bad to good are: one is the population increase goes beyond the tolerance limit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econd is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e corresponding lifestyle become human activity models that damage the environment after the population reaches the environmental tolerance limits. Thre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Dafuyugou Villag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good to bad are: one is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urbanization cause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population ,thus reducing pressur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econd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way of life greatly reduce the resource exaction from human activities ,the third i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1970s.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 the Kalaqin Banner , Dafuyugou Village , ecological environment**National Prevention and Cure of Schistosomiasis in the 1950s** Li Honghe (63)

Abstract: In the 1950s , the prevalence and spread of schistosomiasis brought serious ecological hazards to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in the epidemic - stricken area. With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s important attention ,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masses of the schistosomiasis in the epidemic - stricken area carried out a large - scale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evalent law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istosomiasis. They commonly used the way of controlling infectious source , such as killing snails , managing manure , controlling water and checking patients. All of thos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prevention and cure of schistosomiasis and epidemic - stricken area underwent profound changes , which have provided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to Chinese public health cause construction soon afterwards.

Keywords: 1950s , schistosomiasis ,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country reply**Media , Spouse - chosen and Betrothal Gifts: Rural Youth's Marriage Attitudes and****Behaviors during People's Commune Period** Li Bingkui (70)

Abstract: Rural youth's marria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during People's Commune period had been changed either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 which was an important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state , collectives and families' impact on this group. The matchmaker - arranged marriage was criticized and the introduced - marriage increased ,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upgrading rights to make decision to rural youth's marriage. However , political identity ,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and occupation reputation still had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rural youth's spouse - chosen behavior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